

【德】戈特弗里德·施拉姆 著

赵叶莹 译



世界历史 的 五个岔路口

Fünf Wegscheidungen der Weltgeschichte



人民出版社



世界历史 的 五个岔路口

Fünf Wegscheidungen der Weltgeschichte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安宏川
版式设计:于丽娟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历史的五个岔路口/(德)施拉姆 著;赵叶莹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01-013814-5

I. ①世… II. ①施…②赵… III. ①世界史-历史事件 IV. ①K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1789 号

北京市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号:01-2011-2525

Fünf Wegscheiden der Weltgeschichte. Ein Vergleich von Gottfried Schramm © Vandenhoeck & Ruprecht GmbH & Co.KG 2004, Göttingen, Deutschland



世界历史的五个岔路口
SHIJIE LISHI DE WUGE CHALUKOU

[德] 戈特弗里德·施拉姆 著 赵叶莹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

字数:334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3814-5 定价:5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一、写在前面的结论	1
1.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似的最初经历	1
2. 迥异的社会背景和内容上的相互关联	22
3. 几个相关概念	28
4. 关于本书的产生	31
二、公元前 13 世纪:从埃及走出的移民和一神教	42
1. 以色列的起源问题	42
2. 一支小型游牧部落及其宗教改革	47
3. 米甸	51
4. 埃赫那顿与摩西	54
5. 从农民到游牧民的文化移植	66
6. 再谈米甸	69
三、公元 30—50 年:加利利、安提阿和基督教	76
1. 公元 1 世纪:虔诚的犹太教徒及其末世论	76
2. 和平局势下的非暴力原则	82
3. 末日审判的预言者:施洗约翰和耶稣	89
4. 法利赛人、摩西律法和异教徒	94
5. 耶路撒冷、祭司和圣殿	108
6. 早期基督教	117
7. 圣司提反与基督教徒逃亡叙利亚	126
8. 第一个传教区:地中海东岸周边城市	139

9. 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分道扬镳	145
四、1510—1530 年：中欧的分裂和新教	157
1. 风雨欲来的宗教改革地	157
2. 宗教虔诚：过去时与现在时	160
3. 精神上的邻居：约翰内斯·冯·施陶皮茨与马丁·路德	165
4. 革命开始的地方：萨克森选帝侯国小城维滕贝格	169
5. 城市中的布道坛	175
6. 在全世界引发的反响	185
7. 新教集团和规范教义的产生	189
8. 近代早期：宗教信仰时代	204
五、1760—1780 年：北美洲的英格兰人和代议制民主	208
1. 强大的英国本土及其令人钦佩的政治状况	208
2. 有着广泛选民基础的立法大会	213
3. 一个没有特权的社會	220
4. 独立后的殖民地：开明的共和新制度	224
5. 烙印期的大势所趋	239
6. 严格的政教分离	243
7. 对全世界的影响	247
六、1860—1880 年：俄国知识阶层和革命社会主义	257
1. 前沿地带的重新启程	257
2. 无神论：反抗团体的敲门砖	266
3. 革命思想向欧洲东部边缘移植	281
4. 1861 年农业改革：改革者与激进分子的分岔路	293
5. 叛乱开始：宣言、学生暴动和向民众的转移	307
6. 捷径的幻灭：煽动者和恐怖主义者的组织形式	313
7. 面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国家政权和法律体系的 护目镜	322
8. 没有规范条文运动	336

9. 持续力:影响的余波	341
七、在俄国的继续发展	346
1. 胜利者的优势:1917 年十月革命	346
2. 失败者的软肋:1991 年苏联解体	356
附 录	365
1. 人名译名对照表	365
2. 地名译名对照表	370
3. 参考文献(摘选)	372

一、写在前面的结论

1. 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相似的最初经历

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一条路上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一个岔路口。如果事先没有走过这条路，也没有向导给我们指路，那么我们不可能知道下一步该往哪儿走。一如当年站在十字路口的赫拉克勒斯：当你站在岔路口，你必须做出抉择。 [11]①

同样，社会和文化也会面临这样那样的分岔路，本书将选取一些历史场景对此进行论述。在这些历史场景中，有的人继续向前走，有的人则拐到了岔路上。我们的分叉路口不仅把一条路分成了两条，也把走在上面的人分成了两拨——最初的信仰团体分化为两个不同的信仰阵营。同时，正因为在本质上同宗同源，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分道扬镳的事实，互不服气，乃至反目。

既然本书的主题词是岔路口，那么我们只探讨在世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事件。这些事件并非已结束的遥远过去，而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前史。时至今日仍存在于宗教和政治方面的分界线，有着能够准确确定的历史源头。新的社会制度从它所诞生的时刻起，就走上了其母体文化的对立面。这种一开始很尖锐的对抗肯定不

① 方括号中数字为原书页码。

会始终保持这种激烈状态。当今,不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甚至连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之间都逐渐接近;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和实行君主议会制的英国逐渐成了同一个政治模板的变体。事实上,欧洲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上了曾长期被诋毁为赤裸裸地掩盖阶级统治的民主路线。如今留存下来的共产主义地盘已转移至孕育了它的西方世界之外,其目的也已根本性地转变为使留存下来的国家在强有力的中央控制下走上现代化道路——当然这与本书所探讨的转折性事件已没有太多关联。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在分化过程中新形成的信仰团体,不过,作为其母
[12] 体和对立面的旧的传统文化也将始终在我们的探讨之列。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形成其稳定特征的烙印期,这些脱离母体后重新形成的信仰团体彼此之间非常相似。如果说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表现得尚不明显,那么其原因在于这些变革在空间和时间上相隔太远。从时间上来看,这些变革之间前后间隔三千多年:从公元前 13 世纪到公元 19 世纪。同时,这些变革的发生地空间跨度也很大,囊括了埃及西北部沿海地区、地中海东岸以及欧洲中部、北美和俄罗斯等地区。同时,导致文化分裂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其中发生在古代和近代早期的三次事件属于宗教领域的变革,而 18 世纪和 19 世纪发生的两次事件则属于旨在建立更公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变革。由此可见,之前没有人从类型学的角度将这些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相距甚远的事件放在一起考量。这一点不足为奇。

本书的写作目的便是弥补这一缺憾。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会探讨下列具有转折作用的五次世界历史事件。

——摩西的出现以及以色列开始信仰一神教;

——耶稣突然中断的短暂性社会影响以及这一影响后来在基督教中得以继续;

——作为新教产生起点的中欧宗教改革;

——13 个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本土以及近现代代议制民主制

度的基础；

——1860—1880年在沙皇俄国形成的革命组织，这些革命组织最终发展成为共产主义。

这五次事件跨越一切时空距离，表现出一系列共同的体系特征。其他历史事件似乎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类似的一系列共同特征。总地看来，这五次事件具有下列10个共性。

第一个共性

[13]

除了我们知之不多的摩西改革，其他四次事件都是重要的文化—信仰团体在一个岔路口突然分道扬镳。其中一部分追随者继续原来的信仰；另一部分追随者则找到了一个新方向，用新的精神支柱来支撑其重要生活领域。生活秩序赖以存在的正统根基的改变，导致了这些根本变革。其中，在第二次到第四次事件中（第一次事件很可能也一样），先驱者们并非想要推翻现有制度，而是要对它进行革新。他们认为，母体文化应回归其核心、回归其本质，从这一母体文化中所诞生的文化应得以完善：早期基督教徒旨在对以色列民族进行革新；宗教改革的目的是对基督教进行革新；北美民主制度的创造者们想要在新大陆上完成对英国本土的革新。1860年沙俄的革命者们希望实现一种消灭社会内部政治权利不平等的状况，进而使所有人在经济上都实现平等的民主理想（这一点恰恰是社会民主的本初意义）——从这一点来看，这场革命似乎是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继续。但是俄国最终完成的——与我们探讨的其他事件不同——并不是一场对民主制度这一颇有价值的遗产进行清理和完善的革新。不久之后，这一事件便成为史无前例的一次极端变革、一次抛弃了西方世界最宝贵精神、政治和法律成就的无情而孤注一掷的变革。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摩西改革应该与其他几次变革一致。他希

望革新原始宗教并对米甸进行改革。我们姑且将这一点暂时搁置，在本书第一章我们将会详细探讨这次重大变革性事件。

对第一个共性的解释

革新这个概念包含下面这层含义：即基督教徒全盘接受了《犹太教圣经》^①。虽然新教对于天主教教义的态度日渐不同，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传统信仰，坚决同撼动传统三位一体论的反三位一体论者划清界限。随着十诫的产生，传统基督教从犹太教经典中继承的核心部分，也被收入新教教义典籍中。

北美洲事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引入了全新的政治制度类型——以成文宪法为基础的代议制民主。与此同时，美国也依然继续传承着英国本土的传统，这一传承非但从未在美国消失，反而在那里得以延续和完善，例如将公民自由权写入宪法，实行不成文的法律体系等。而欧洲大陆法系在18世纪时就已经走上了现代化、体系化编撰法典之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曾寻求与激进的非社会主义民主主义者的同盟，从而产生了比它最初的革命理想更深远的影响。因此，上述几次大事件可以说都与革新有关。

乍一看来，这一点也适用于1860年的俄国革命者。他们自认为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和完善者，从而间接成为这之前的美国革命的继承者和完善者。但是，这些革命者还没来得及草拟出对传统进行革新和完善的范本，就把它抛诸脑后。俄国激进分子是在没有任何民主制度背景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从未学会在继承和扩大那些先进国家所建立的制度的基础上起草一项革命章程。他们并不渴望将宝贵的传统发扬光大，而是希望尽快斩草除根，重新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一方面，俄国激进分子可以纳入我们探讨的变革系列；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具有的一些特点，它又与其他变

① 即《旧约全书》。——译者注

革明显不同。这一点将成为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

第二个共性

在四次变革——或者说在所有五次变革中,都是子文化从母体文化中脱离。每一次的阵营分裂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除了其进程速度尚无法确定的摩西改革之外,其他的阵营分裂估计也就用了大约 20 年的时间——基督教、新教、代议制民主和革命社会主义等初具雏形所需的时间,基本上没有超过 20 年。

对第二个共性的解释

[15]

当然,上文说的 20 年只是大体上把这些彼此迥异的进程统一起来的一个时间标杆。一般认为,基督教形成的烙印期持续了大约 40 年,也就是一直持续到耶路撒冷陷落和最早的福音书的产生。但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公元 50 年左右,当众多基督教会纷纷在罗马成立、圣保罗开始创作保罗书信时,这场新运动已具备稳定、持久的雏形。而宗教改革和美国革命,则必须连同准备阶段在内才够得上 20 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并非要像自然学科那样追求严格的规律性,而只需寻求大致的共性。在这五次事件中,新的信仰团体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产生,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和好奇。因为在这些事件中,并没有出现如燎原之火般迅速蔓延的重大技术发明或科学原理。相反,这种转折发生在从历史经验来看不具备任何骤变趋势的基本信仰领域。

对比另外两种至今仍在影响着人类的全新世界观的产生过程,我们就能发现这五次事件的发生何其迅猛: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完美地描绘了一种始于意大利的全新生活态度。这种全新的生活态度是在漫长——约从 13 世纪到 16 世纪——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最终才发展成早期启蒙运动;从 16 世纪初尼古拉·哥白尼在名为《纲要》的小册子中首次介绍日心体系,到 1687 年艾萨克·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天体

观与经伽利略·伽利雷改革的物理学统一为一个整体——从数学角度阐释传统物理学的新宇宙观形成花了近 200 年的时间。这两场同样深刻改变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的历史进程,都用了比我们所探讨的五次事件多得多的时间。

[16] 第三个共性

这些转折性事件都没能替代他们所变革的那种社会制度。多神教、犹太教、天主教、实行传统制度的英格兰王国、西方民主制度及其资本主义经济改革,所有这些社会制度都有足够的生命力来经受挑战。不过,挑战者也经受住了考验。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母文化和子文化的长期分裂,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转折性事件中甚至出现了彻底分裂的局面。比起其他那些发生在较长历史时期里的转折性事件,这五次事件对当今西方人的面貌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

对第三个共性的解释

在后两次转折性事件中,最初分道扬镳时形成的敌意并未延续,而是出于各种原因在不同时期逐渐消解。在其他几次转折性事件中,两个信仰团体之间虽然至今仍处于对立状态,双方谁也不愿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应该说相互之间也是在逐渐靠拢,彼此之间的隔阂也不再那么深——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越来越意识到,无论从历史根基还是从精神实质来看,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看法都是一致的;关系一度破裂的基督教界也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中逐渐靠拢,并从中产生出跨教派合一运动组织。基督教徒们开始认识到,所有将其各个教派分隔开的东西,都不如它们建立在其上的共同根基来得重要。虽然很多稳固的信仰都难免刚愎自用,认为只有自身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激烈对峙绝不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不管在过去还是在未来,世界历史的最终发展方向始终都无法预见。

第四个共性

我们探讨的这几次变革的另一个典型之处是，它们并不为某一特定的社会或文化服务，尽管其中至少有两次思想转变——1520年左右的德国和1860年左右的俄国——都产生于狭小的社会环境并带有其思想印记。可以说，这些变革中没有一次是某一特定社会或文化群体关心的个别利益的体现，每一次都是针对所有人发出的“福音”，其目标面向所有阶级。虽然第五次变革的“福音”最初并没有传播到本应作为布道对象的农民，但是仍然可以说，所有这些变革引起的反响都没有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 [17]

平等精神赋予新信仰团体以灵魂。之前拥有世袭特权的精英被新的代表人物取代。这些新代表人物往往通过选举获得地位，和之前拥有世袭特权的精英不同，他们是作为实干型精英获取自身威信。

对第四个共性的解释

当然，每一次变革的具体情形并不相同。我们只能推过类比的方法推测摩西倡导的社会制度中包含了平等这一要素。同样，关于扫罗王统治期间的以色列向君主政体的过渡是否也同时受到了早期平等主义的影响，也几乎无法确定。

耶稣力图消除被他视为不公正的宗教隔阂，将佃农和妓女也作为自己的布道对象，同样是一种平等的表现。他甚至公开反对将麻风病人排除出宗教团体之外以及不对其履行救济义务。他指责法利赛人意图通过一种比他们平常更虔诚的生活方式从众生中脱颖而出，从而在上帝面前凸显自己，而我们所有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并且永远都是有罪之人。他对撒玛利亚人这一在以色列被视为背叛者的特殊群体寄予了比对他同时代的犹太同胞多得多的同情和关注。他与享有特权的犹太教祭司贵族阶层展开论战，并赋予他周围的妇女以极大的平等地位和权利。早期的基督教牧区取消犹太会堂中适用的男性特权，并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因此从一开始，基督教的队伍中就既有地位尊贵者，也有低贱的奴隶。

宗教改革取消了拥有极大特权的教士阶层。可以说,“所有教会成员一律平等”这一原则使加尔文宗从路德宗教徒和英国国教徒等级森严的教会统治集团中脱离出来。新教宣布信徒皆祭司,并将普通劳动者推向风口浪尖,使之努力去争取整个社会的支持。

后面的两次变革虽然不是宗教领域,而是政治领域的变革,但是,平等,这一基本特征依然得以延续。美国革命创造了一种政治体制,在这一政治体制下,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地位尊贵而担任公职或者仅仅因为不够富有而被剥夺选举权;俄国革命者则希望将民众从社会桎梏中解放出来,并通过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完全平等的社会来改写历史。

在以色列早期的部落划分中,由亚伦后裔联合而成的利未部落受到了其他部族的排斥。作为 12 个部落中唯一一个没有分到领土的部落,利未部落还被独自赋予了祭司职责。以这种方式形成的阶层很可能对于保持对耶和华信仰的纯洁性具有重要意义。耶稣挑选了 12 名使徒——这一数字正好与以色列散居部落的数目一致——以这些人作为中心建立起了耶路撒冷最初的牧区。从圣彼得被任命为罗马主教开始,由主教作为支柱的国教逐渐成形。

强调信徒皆祭司的新教从一开始就依赖于职业传教士,注重从中学和大学开始培养新的宗教接班人。不过,作为普通市民的新教神职人员往往由世俗当局委任,不搞国中国,也不属于社会内部的特殊群体。这种新型神职人员取代了原本在上帝和信徒之间起重要中间人作用的天主教教士。虽然美国在坚持公职人员和法官有被选举权的同时并没有将公民政治平等权扩大到消除财产和收入区别的程度,但仍旧可以说美国对它的立国章程保持了忠诚。

由各个知识阶层集团组成的俄国革命者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为劳动大众服务。对于最初出于形势需要、为解放工农而从农民和工人中选出的这些知识分子先锋最终将何去何从这一问题,产生于 19 世纪 90 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宣布不受任何人控制,任何人都不能通过选举使其下台,而是由其自行决定哪

些人属于本党派并因此而分享权利。同时,对广大成员的领导在事实上不受任何限制这一趋势,也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下来。从而,第五次变革——尽管与前面的几次变革相比,以更激进的方式将平等写入其纲领——从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的那一刻起,就显得不那么平等。对此,东欧社会主义阵营曾讽刺说:所有的人都平等,只不过有一些人更平等。

布尔什维克对平等理念的背离,还表现在 1936 年宪法颁布之前,他们将资本家、地主和神职人员列为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他们认为,这些人是被消灭制度的代表,如果不加以注意,还会重新构成威胁。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克服阻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纲领,因此才会建立起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为实现平等的终极目标,这一专政政权放弃了眼前的平等。

第五个共性

所有这些新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源于较小地区范围内的母体文化,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渴望大大跳脱他们所兴起的那一地区。用基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内心强烈感觉到,上帝委托他们将福音传递给所有人。最初的局部震荡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传教式运动,甚至在那些他们没有特意去游说的地区也传播开去,因为很多人对他们宣扬的东西都很感兴趣。

对第五个共性的解释

从表面上看,摩西改革脱离了前面概括的模式:他使上帝拣选的子民以色列从所有民族和宗教中分离出来,因为以色列信奉创造了整个世界及所有居民的唯一的上帝耶和华。但是,非犹太教徒也是上帝的子民,总有一天上帝会向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发出启示。而对于后面的几次变革来说,有一点显而易见,即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一种希望的鼓舞:令他们自己感到振奋不已的想法,能够很快向四面八方传播开去。也就是说,这 [20]

五次运动从一开始就锁定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目标,这一点可以很好地解释一些离奇的特殊现象。比如说:为什么罗马帝国中两个一神论的信仰团体——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受到完全不同的待遇?如果犹太教徒不惹是生非,他们就可以一直不受打搅,而基督教徒则总是遭受一轮又一轮的残酷迫害。对于这一奇特现象,我们可以从下列事实中找到答案:与犹太教徒不同,热忱、开放的基督教不断招募新成员,而这一做法可能会损害到罗马帝国的国家利益,有关这一点我们会在后文继续讨论。

在接下来的两次变革中,并没有出现激昂澎湃的大规模传播,但其传播速度依然非常迅速,这一点让人无法理解。短短 10 年间,产生于德国的新教就在瑞士的一些地区扎根,甚至继续扩展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1787 年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曾抱有这样的信念:他们建立了一个将成为全世界光辉榜样的国家。两年后,在法国上演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革,这次变革极有可能借鉴了美国的样本。我们刚刚共同经历了美国自 18 世纪建立以来从未表现出的强烈的传播野心,只不过现在依赖的是史上最强大的军事机构。^①

宗教改革以来,除了有使者自觉地在各地区口头传播新宗教外,印刷品也发挥了向外传播的远距离影响。说得形象一点儿:种子不仅由勤劳的播种者播撒,而且也靠风来散播。

俄国革命者从一开始就希望革命的星火能够传播到别的国家。这一点得到了人数众多的中西欧社会主义者的一再认可。即使 20 世纪 20 年代对爆发世界性革命的期待逐渐减弱,他们向外传播革命的渴望依然没有泯灭。此外,这种渴望导致苏联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军队发动一场进攻战这种**武装式传播**的方式来肃清资本家的抵抗,就像他们在 1920 年进军波兰^②时尝

① 此处应指美英联军于 2003 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译者注

② 指 1920 年苏波战争中苏维埃俄国对波兰首都华沙发起的反攻。——译者注

试的那样,不过这一想法造成了 1941 年的灾难性后果^①。查理十二世^②和拿破仑进攻俄国双双惨败的经验表明,俄国总是能够预计到敌人的现代化装备和一开始的战斗能力会超出自己,但又总是能通过战略撤退防御把敌人完全牵制住并消灭掉,这一点已被克劳塞维茨^③提升为俄国定律。1943 年,从最初的惨败中吸取了正确的战略经验之后,这种撤退防御方式再一次获得成功。在这次事件中,传教式野心显示出了消极的一面。[21]因为它妨碍了苏维埃领导层及时部署出与 1941 年的状况相符的解决方案。斯大林犯了一个和当年法国人相反的错误。当年法国人在一战中取得防御性胜利后便单方面转入防守,而当时的西线战场需以进攻来击退希特勒。

引言的后面部分会进一步探讨这五个开端期的传教特征,因为这一点对本书至关重要。

第六个共性

当历史在其逐渐演变的正常进程中出现变迁时,先驱者的角色常常会落到那些在文化上达到最高文明状态的地区身上。而我们这里探讨的几次变革却恰恰不是发生在各自文化的核心或本土地区,而是发生在它们的外围。换句话说:每一次转折都发生在文化密度较低的边缘地带。

对第六个共性的解释

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一般总是由先进地区充当先驱者角色,对于这

① 指 1941 年苏德战争。此次战争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伤亡极为惨重。——译者注

② 查理十二世(Karl XII,1682—1718),瑞典在北方战争时期的国王,曾亲率大军进攻俄国,遭遇惨败。——译者注

③ 克劳塞维茨(Clauswitz,1781—1831),德国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著有《战争论》。——译者注